

网络公共领域发展与新型政社关系建构

吴青熹^{*}

〔摘要〕 现代思想家在关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问题上形成了社会本体论与国家本体论两种不同立场,但实际上,无论是强调市民社会,还是强调作为最高公共机构的国家,其背后所关注的问题都指向“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指公共讨论涉及国家活动并能形成公共意见的领域,其核心是通过媒介形成的、能够主导社会舆论的意见场域。互联网的兴起引发传统政社关系的巨大变迁,最显著的表现就是由于社会化媒体的发展所产生的新型网络公共领域。要建构适应互联网时代需要的新型政社关系,需要对网络政治公共领域进行治理,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要找到不同网络社群对话的“合意空间”,并成为网络舆论规则的制定者、公共议题的设置者和公共规则的维护者,从而形成具有正能量的网络舆情,以此来掌握“文化领导权”。

〔关键词〕 网络公共领域;政社关系;社会治理;社会化媒体;文化领导权

互联网的诞生和飞速发展深刻影响了现实社会的政治运行方式和国家治理模式。从政治运行方式来看,无论是民意表达与民间舆论场的形成、意识形态变迁与网络文化发展、网络参与与社会民主的网络化发展、网络社会运动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兴起,还是公共行政机构的组织和流程管理变革、政党建设和合作治理的出现、全球治理和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建立等等,都与互联网运行机制具有密切的关系。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网络社会的兴起,使得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传统政社关系在网络社会中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由于互联网这一新兴传播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促进了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不断解构着传统的政社关系范式;在网络社会主体多元化和民间舆论兴盛的背景下,政府不可能再完全扮演唯一正确观点、正确主张的表达者,而是应当努力成为网络公共议题的设置者和公共规则的维护者,以此来引导公共舆论。这就迫切需要建立一套适应互联网规则的新型政社关系,而新型政社关系建构的关键在于政府要通过民主协商、合作治理,以制定出政府与社会双方都认同的规则,这一点和政府以往在以往政社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相比有着很大差异。这是网络时代新型政社关系建构的关键和核心问题。

^{*}管理学博士,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社会学部副教授,210009。本文是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互联网与大数据视野下意识形态建设机制研究”(17MLB012)阶段性成果。

一、公共领域:政社关系的核心问题

政社关系问题是政治学的经典问题。在西方,从古希腊城邦到近代市民社会的兴起,政社关系经历了一个从紧密融合到逐步分离的缓慢过程。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力量的迅速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兴起,引发了社会结构的重大改变,工商业资产阶级开始崛起并逐步成为与王权相对抗的重要社会力量。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自然地增进全社会的利益,国家只是市场型社会的守夜人,不应当对市场进行干预。在这一认识基础上,近现代启蒙思想家们逐渐形成了一种“社会本体论”的思潮。“社会本体论”认为:社会先于国家而存在,社会高于国家,国家要受到社会制约。这一思想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对抗封建王权、建立现代社会的有力思想和理论武器。

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社会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完成了它反抗封建王权(即传统国家权力)的思想启蒙作用;与此同时,过于强调社会以及市场经济的作用反而导致了社会失序和市场失灵,一些具有现代性社会批判意识的思想家们对社会本体论思潮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国家本体论”的思想。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自我削弱的趋势,如果要维持其市民性,那么它就必须诉诸一个外在的但却是最高的公共机构,也就是国家。”^①在黑格尔看来,国家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国家是高于社会的。至此,现代思想家们在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社会本体论与国家本体论。从总体上看,国家本体论和社会本体论代表了近现代政治思想界对政社关系的两种主流看法。表面上看,这两种思潮是对立的,但实际上却是共通的,因为无论是斯密所说的作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社会,还是黑格尔所说的作为“最高的公共机构”的“国家”,其背后所关注的问题都指向了“公共领域”,即一个与人类社会公共事务相关的领域。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强调国家本体论还是强调社会本体论,都是因为特定的时代需要强调不同的主体(政治国家或市民社会)对公共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对于政社关系的理解与把握,需要深入到公共领域之中。

所谓公共领域,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首先意指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媒介。当公共讨论涉及与国家活动相关的问题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公共领域”^②。这表明,公共领域首先是一个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区别于私人生活的领域。其次,公共领域中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够形成公共意见,即卢梭所说的“公意”,从而影响现代政治发展进程。再次,这种“公意”需要依靠传播媒介才能形成,在19—20世纪,主要的传播媒介是哈贝马斯所说的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而在当代,互联网则成为最主要的传播媒介,因为所有的传播媒介都已互联网化了,因此可以说当代的公共意见主要体现为网络公共舆论。第四,如果公共领域所讨论的问题以及所形成的公共意见涉及国家活动,那么这个公共领域就是一个“政治公共领域”。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政社关系中所讨论的公共领域必然涉及国家活动,因此其核心便是政治公共领域,而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无论学者们的关注焦点是国家还是社会,其核心都涉及这个通过媒介形成的、能够主导社会舆论的意见场域,也就是政治公共领域。而在网络时代,政治公共领域更拓展到了网络虚拟空间而型构为虚拟公共领域。而所谓“虚拟公共领域,是指由宽带上网、地面拨号上网、专线上网以及卫星传送网络等所提供的迅捷传送信息的技术支持,以各种虚拟空间的创建与虚拟社群的集聚为前提,向虚拟社群中所有参与者开放的、以各参与者相互之间自由讨论各种

①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53页。

②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汪晖译,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25页。

共同话题为主要内容的情感沟通、思想交流、精神交往的虚拟平台与公共场域。”^①当前,虚拟公共领域已经成为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和公共生活等不可忽视的公共领域。

从国家(统治)的角度看,政治公共领域的核心是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导权的问题。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既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②,也是特殊的暴力机器,“系统地使用暴力和强迫人们服从暴力的特殊机构……就叫作国家”^③,还是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和提供者,“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④。换言之,国家既是统治机器,也是公共服务机器。从这一角度看,国家兼具政治统治与公共管理双重属性。就国家的政治属性即政治国家而言,它主要指政治上层建筑,是“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在一定的领土范围内通过合法垄断暴力的使用权而对其居民进行强制性管理的各种组织机构及其体现的强制性等级制关系的综合体”^⑤。这个综合体除了包括常见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以及各种相关的政治制度,还存在着大量生产和传播意识形态的各种机构,这意味着国家不仅是强制性国家机器,同时还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指的是一整套意识形态的、宗教的、道德的、家庭的、法律的、政治的、审美的以及诸如此类的机构,掌握权力的阶级运用这些机构,在统一自身的同时,也成功地把它的特殊的意识形态强加给被剥削群众,使之成为后者自己的意识形态,一旦出现这种结果,沉迷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真理的芸芸众生就会认可它的价值(从而赞同现存秩序),而必需的暴力要么可以节省下来,要么被留作杀手锏使用”^⑥。由于与“统治”相对的“治理”概念强调的是多元主体间的合作,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国家治理的重点不仅在于强化强制性国家机器的功能,更为重要的是要强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功能。

对于国家来说,需要通过意识形态机器来领导政治公共领域,葛兰西称之为“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以维护政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这在传统传播媒介即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占主导的时代比较容易实现,因为国家可以直接掌握这些传播媒介,从而直接影响和领导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走向。然而,互联网的兴起特别是社会化媒体的出现,打破了国家垄断意识形态机器的局面。国家不再能够垄断所有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渠道,而普罗大众通过社会化媒体,拥有了过去只有统治阶层才能享有的信息发布权力,可以自由地通过互联网发布信息、发表意见,从而形成公众舆论。这对传统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产生了极大冲击。正如阿尔都塞所指出的,“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在掌握政权的同时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在这套机器中行使其领导权的话,那么它的政权就不会持久”^⑦,从这个意义而言,互联网打破了国家一直以来对公共领域与公共舆论的垄断,削弱了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

从社会(自治)角度看,公共领域的核心问题是公共舆论与社会文化生活问题。在这里,社会是与国家相对的概念。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不是个人的机械的集合体,而是个人之间的联系和关系的总和”^⑧,这种“个人之间的联系和关系的总和”体现为生产关系的集合,“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⑨。马克思认为,现代市民社会作为现代生产关系的集合,“完成了同政治生活分离的过程”^⑩,并“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⑪。这是因

①杨嵘均:《论虚拟公共领域对公民政治意识与政治心理的影响及其对政治生活的形塑》,《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4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4页。

③《列宁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2—6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59—560页。

⑤唐士其:《“市民社会”、现代国家以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⑥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9页。

⑦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第338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24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44页。

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0—131页。

为,市民社会包括“独立于国家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①,其中,“私人领域指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领域,公共领域指社会文化生活领域”^②。

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属性指向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公众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自由地表达和公开意见”^③。由于公众对话的焦点主要是与个人切身利益相关的各项公共事务,尤其“关注社会问题在私域生活中的反响”^④。这些对话既可以通过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正式媒介传播,也可以在沙龙、剧院、宴会、咖啡馆乃至街头集会、广场演讲等各种公共场合非正式流传,当这些反响不断放大并集中后,就会形成某种公共舆论。这些公共舆论不仅是对国家公权力的批评和监督,还是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极大挑战。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公共舆论的兴起会自然地“形成一种社团的网络,对公共领域中人们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形成一种解决问题的话语体制”^⑤,这种“社团的网络”是公众舆论在实践中的组织化反映,会形成以社会组织为单位的、自组织化的集体行动——网络群体性事件,从而在一定范围内对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和政治安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构成了当代政社关系的核心议题。

二、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与互联网时代政社关系变迁

从人类社会历史看,前三次工业革命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新生产力对旧生产力的颠覆。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新生产力必然会重构生产关系、改变组织形态,进而引发社会关系的重大变革。当前,我们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互联网对社会关系、尤其是政社关系产生了巨大冲击,最显著的表现就是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互联网时代的最大特点就是整个社会的“互联网+”,也就是社会中的所有人、事、物都开始主动接入互联网。互联网赋予一切人以同等的信息权力,普通人不仅能够在最大限度上拓展信息源,得以享有过去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的信息;而且还能与传统媒体平起平坐,成为可以向外发送信息的信息源。掌握的信息多了,表达的需求就大了,人们开始希望能够自由地对与个人切身利益相关的各项公共事务充分发表意见,逐渐形成一个网络公共领域。

互联网赋予一切人以同等的话语权力,由于其匿名性,人们可以抛开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约束,无所顾忌地在网络中尽情披露信息、抒发感受、发表意见、品评时事、参与互动,形成了全民发声的新格局。“互联网+公共领域”的直接后果是原来在实体空间才能进行的各种对话开始向网络空间转移,开辟了政治公共领域的互联网新阵地,并直接引发了网络舆情的兴起。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利益格局不断调整,在社会结构的变动过程中滋生了大量的结构性紧张和结构性怨恨,互联网为这些受损的利益需求、压抑的个人情绪提供了宣泄渠道,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纾解的各种碎片化、情绪化和多元化的紧张情绪得以通过互联网表达,这造成了网络舆情的活跃^⑥。

虽然网络政治公共领域出现的时间只有十多年,但它已走过了互联网和社会化媒体两个阶段,其中,互联网阶段是网络政治公共领域出现的催化剂,而社会化媒体阶段则是网络政治公共领域发展的加速器。社会化媒体是“一种给予用户极大参与空间的新型在线媒体,能够提供用户参与、内容公开、用户交流、用户对话、社区间信息连通的功能,其特点是赋予每个人创造并传播内容的能力”^⑦。与广

①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及其结构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70页。

②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及其结构转型》,第171页。

③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汪晖译,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125页。

④ J. Haberma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p. 367.

⑤ J. Haberma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p. 367.

⑥ 详细论述,参见杨嵘均:《网络空间公民政治情绪的宣泄方式及其治理策略》,《江海学刊》2015年第6期。

⑦ A. Mayfield, *What is Social Media*, iCrossing, 2008.

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相比,社会化媒体的信息传播具有其独特性:一是信息碎片化,在过去,由于人们的注意力较为集中,传统媒体单次传播的信息量较大,随着个人时间开始被各种移动端分割,社会化媒体信息传播的“单元量”开始逐渐降低;二是信息个性化,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必须遵循国家规训的框架和角色身份的限制,而社会化媒体传播则可以畅所欲言,无需拘泥于规训表达,来自不同阶层的声音催生了大量个性化的观点;三是信息民主化,当发声的权力不再被约束,就预示着话语权开始逐步从权力向权威让渡。社会化媒体的话语权大小完全依赖于信息的转发和评论数,不受政治因素影响。可以说,社会化媒体凭借其“多对多”的信息传播特性和社交化的沟通方式,打破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垄断,推动了网络政治公共领域的兴起,建构出一种新型的政社关系,这构成了当前政府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政治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社会化媒体解构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社会化媒体出现之前,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承担了政治传播和政治动员的职能,社会化媒体的出现对传统媒体产生了巨大冲击。首先,社会化媒体改变了传播向度:在过去,整个社会只有官方媒体这一个信息源,人们只能自上而下、被动地接收信息,而社会化媒体将每个人都变成了信息源,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随地自由地发布信息;其次,社会化媒体改变了内容供给:在过去,传统媒体只负责内容生产,但并不注重读者的反馈,而社会化媒体则注重与读者的互动交流中,并鼓励读者积极参与内容生产;第三,社会化媒体改变了传播效果:在过去,传统媒体独白式的传播方式忽略了读者的需求和体验,而社会化媒体通过提出议题,激发受众的讨论和反馈,引导人们主动创造信息而不是单纯的推送信息,实现了由内容生产专家到网络沟通专家的角色转变。

2. 社会化媒体推动了民间舆论场的兴盛。社会化媒体是网络围观的载体,参与围观的网民越多,产生的评论就越多,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评论背后隐藏着各种情绪,相同情绪的聚合会形成某种心理潜流,小则形成网络暴力、网络谣言,大则会演化为现实的社会集群行为。当前,网友已不再满足于打酱油、看热闹,而是自发组织起来参与和干预热点事件,通过虚拟世界对当事人产生实际影响。被动围观的时代正在被主动干预的后围观时代所取代。网络围观的直接后果是形成了民间舆论场。由于官方媒体的信息发布都是按照宣传纪律,以统一口径进行的,在敏感问题上难免有所规避、反应滞后,这在各种社会思潮频发、人民意识形态异常活跃的今天,已难以令人满意。而民间舆论场则能即时反应,通过网民间相互纠偏、复合印证,进行结构性的信息提纯,多角度和全方位地展现公共事件的全景,从而推动公共事件的进程。在人人都是麦克风的时代,民间舆论场构建了全新的公共话语空间,这一空间对普通人的影响远远大于官方舆论场的影响。从本质而言,民间舆论场是日益觉醒的社会力量希图取得更多的话语权,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民众迫切希望解决公权力运用与人民利益受损之间的矛盾。

3. 社会化媒体改变了社会组织方式。在过去,人们是以血缘、地缘、单位为标准组织起来形成不同的圈子,通常只与圈内人频繁互动,与圈外人联系较少,而社会化媒体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组织方式,它不仅使原有的圈内人互动更加紧密,还把社交圈向圈外拓展。社会化媒体既是传播平台也是交往平台,它不仅可以帮助人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随时和原本素昧平生的人建立起互动和联系,改变人与人之间认识、交往和深度链接的方式,还可以帮助人通过社会化媒体的平台建立品牌、扩大影响力。社会化媒体的重要特点在于它并非向所有人传播信息,而只是向个人社交网络上的人传播信息,传播范围是有选择性的。因此,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很容易在网络上寻找到互相认同的人,建立起完全基于个人兴趣、爱好和价值观的圈子,同时,他们还可以相互集结形成各种各样的网络社群,进一步把圈子从实体空间拓展到虚拟空间。网络群体性事件就是以网络社群为载体的新型组织行为,一般而言,这类聚众行为有两种类型:一是纯粹在网络空间展开的网络示威、抗议、声讨等,二是以网络社群为中

介,网上网下相互呼应的聚众组织行为。

4. 社会化媒体对日益多元化的社会组织和民众进行赋权。信息壁垒被打破,权贵阶层其实就被“祛魅”了。实际上,网络权力的本质是网络赋权,就是互联网赋予民众,特别是传统的、处于边缘的社会群体以平等的信息权力和表达权力。^①在社会化媒体中,个人真实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不再是权力的标志,是否能生产用户感兴趣的内容、是否能吸引更多的眼球才是衡量个人权力大小的唯一标准。同时,社会化媒体还赋予了普通网民用手投票的权力,网民只需要动手转发、评论、点赞,就可以行使意见权和评判权,并通过信息的分裂式传播,聚合相同的意见,聚沙成塔地放大自己的权力。

从总体上看,一方面,网络舆情是互联网时代整个社会民情民意的真实表达,它的兴起标志着互联网对社会的赋权和社会力量的日益强大;另一方面,民众的呼声、诉求和政治批评与各种民间媒体相互呼应,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民间政治舆论场,并通过不断放大的“广场效应”对国家产生强大的舆论压力。民间政治舆论场这一网络政治公共领域对传统官方媒体的动员式治理形成了有力挑战,对传统的政社关系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产生了彻底颠覆。政府再难以用捂盖子、发通稿的方式来处理社会矛盾、控制突发事件,而必须关注网络政治公共领域,走网络群众路线,才能知民情、解民意,形成社会共识。“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②。

三、网络舆情、网络社群与网络公共领域治理

互联网时代的重要特点就是整个社会的“互联网化”,也就是社会的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都形成了若干独立的网络社群。在实体空间中,人与人的组织方式具有明显的圈层特征,原子化的个人以网络的方式相互联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不同的“圈子”和“部落”。这些不同的“圈子”和“部落”成员,在应用网络技术相互沟通的过程中,把现实生活中的基于地缘、业缘的小型地域性组织搬到了互联网上,形成了基于网络的社群。除了这种基于现实人际交往形成的网络社群外,人们开始基于自己个性化的兴趣爱好、目标需求和价值观在虚拟空间中寻找知识交换、问题交流、爱好分享和交易达成的对象,当“足够的人、情感与人际关系在网络的虚拟空间上长期互动、交流与沟通而产生社会聚合体”^③时,网络社群便产生了。与实体空间的网络社群不同,这种基于虚拟空间的网络社群是数字化的个体间形成的模拟与想象的共同体。它的最大特点在于,社群成员所认同的理念、信仰、价值取向和社会选择在讨论中会被不断放大,最终会形成极端一致的观点,完全听不到现实中可能听到的批评和反对的声音。

互联网的出现,既为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机遇和舞台,也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出了重大挑战,简单地说就是要建构适应互联网时代需要的新型政社关系。这种新型政社关系主要体现为国家对网络政治公共领域的治理,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网络舆情和网络社群的治理^④。

目前,网络舆情治理的主要问题是网络表达与网络围观所引发的事件。由于互联网激发了每个人的表达天性,使得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在网络上接受信息和进行意见表达,特别是微博、微信出现后,

①对此问题,学者杨嵘均等在《论网络虚拟空间政治沟通对执政合法性的影响及其互动生成机制》(《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以及《论网络虚拟社群对政治参与和政治民主的误导与疏导及其协同治理策略》(《东岳论丛》2015年第9期)等论文中,作了丰富的具体的论述。

②《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04-26。

③H. Rheingold,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Reading, MA: Addison Wesley, 1993.

④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网络舆情和网络社群都属于网络政治公共领域,仅关注私人领域的网络舆情和网络社群在本质上属于私人领域,不需要纳入到“政社关系”这个具有一定政治内涵的概念中来理解与分析。在本文中,网络政治公共领域是特指从原来的政治公共领域中分化出来的,关注政治公共问题的网络舆论和网络社群。

网络民意表达更加活跃,形成了人人都有自媒体,个个都是麦克风的局面,也就是说在国家用“喇叭”喊话的同时,一直作为听众的网民,开始各自独立地评说朝政,臧否人物,从旁观者、倾听者和沉默者的角色转向报道者、评论者和参与者的角色。充分表达的意欲与自媒体嫁接后,热点事件、突发事件开始迅速引发网友的集体关注、转发、点赞和评论。有学者把这种网友自发的意见表达、人肉搜索、议程设置以及信息交换行为称为“虚拟网络围观”。网络围观是一种新型的舆论监督,这种监督主要是通过信息转发的形式进行的。它与传统传播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具有“层级传播效应”。心理学分析认为:围观能够满足人们参与社会事务的需求,围观的同时,似乎自己也实际参与了社会事务。围观本意是指路见不平,大家并不拔刀相助,而只是作为看客看看热闹,然后就作鸟兽散,并不会产生什么政治的、社会的影响。而网络围观是人们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对社会热点事件自由发表意见,形成舆论监督或产生政治动员,这就直接产生了某种政治的、社会的后果。舆论监督与传统社会监督相反。正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里所指出的:“塔楼是极权社会的象征”,但如今,大量网友就是那些监视、监督中央塔楼的人,所以现在官员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为只要被网络围观,就必然惹火上身。

而网络社群治理的主要问题是网络群体极化所引发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由于社会化媒体所造成的“圈子化”、“部落化”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联方式。从传播学意义上看,一种新媒体的出现,不仅拓展了传播渠道,还带来了社会连结关系的改变、社会游戏规则的改变和舆情生态环境的改变——由此会引发一系列沟通关系、利益关系以及主体间力量对比关系的调整。过去,人们生活在实体空间,受到现实关系的种种约束,现在,借助互联网和社会化媒体,人们可以在更为广阔的虚拟世界建立起“同声相求、同气相求”的网络社群,“在网络空间,来自同一阶层的网民很容易形成情感共鸣并联结成一个整体”。^①网络社群具有某种“正反馈”效应,即“圈子(社群)”内的声音被放大,“圈子”外的声音被压低,这大大强化了人们对自己社会选择的自信程度,却削弱了不同社会观点和价值取向对他们的影响。

政治公共领域互联网化的标志就是大量政治性网络社群的出现,虽然这种网络社群有利于网民积极参与参政议政,但也很容易产生“群体极化”的恶果。“群体极化”是指社群意见领袖大肆传播有利于自己立场的言论,并在与社群成员频繁的网络互动中,用激进的观念和情绪引发成员高度的情绪共振,无视不同于自己立场的意见。在此场域中,持反对意见的成员会在强大的环境压力和认知威胁下保持沉默,这使得意见领袖的意见能以压倒性优势形成舆论一律,从而出现“沉默的螺旋”的倒置。所谓“沉默的螺旋”指的是“舆论的形成是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人们对意见气候的认知心理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经大众传媒强调提示的意见由于具有公开性和传播的广泛性,容易被当作多数或优势意见所认知。这种环境认知所带来的压力或威胁感,会引起人际传播中的劣势意见的沉默和优势意见的大声疾呼的螺旋式扩展过程,并导致社会生活中占压倒优势的多数意见形成舆论一律”^②,从而导致群体极化的出现。“群体极化”不仅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威胁社会的有序运转,还有可能对公众舆论特别是主流舆论产生歪曲或绑架。这与“公共领域”所倡导的各群体之间理性交流互动的本意形成了背离。

对上述问题的治理,笔者认为,重点应落在网络舆论规则议程设置与新型政社关系建构这两个方面:1. 由于前互联网时代的意识形态机器一直掌握在政府手中,可以说,掌握了意识形态机器就真的代表了民意,现在,由于技术赋权,意识形态机器可以被低成本拥有,特别是意识形态机器“微”化(微博、微信)后,民间社会力量也可以掌握意识形态机器,这就使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再能全面代表民意,民间意识形态机器的重要性开始浮现,并日益成为民意的代言人。因此,如何找到不同网络社群

① 尚红利:《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政府治理的困境及其消解》,《行政论坛》2016年第2期。

② [德]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沉默的螺旋》,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9页。

对话的“公共领域”，也就是找到不同网络社群间的利益、需求及价值表达的共同点，引导形成具有正能量的网络舆情，应该成为政府的主要功能、工作重心和构建新型政社关系的关键所在。可以说，政府一统媒体、官方舆论场代表全民意见的时代已被互联网颠覆，网络社群与民间舆论场的兴起以及政府的网络表达成为微博“群殴”的对象便是明证。2. 在构建新型政社关系的过程中，政府如何定位自身角色尤其关键。从学理上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代表了全体人民利益，是全民意见的代表，这构成了我国当代政治的合法性基础。但实际操作中，全民意见的代表不等于全体民众所有意见的代表，而是卢梭所说的“公意”（区别于“众意”）的代表，这个“公意”代表的整个性的利益。这公意与众意二者在日常语境中的混淆：公意代表整体性的利益、长远的利益；众意则只是代表多数人的意见，它有时会成为“多数人的暴政”。由于互联网时代民间意识形态机器所导致的网络舆情和网络社群的兴起对现存的政治合法性形成了强大挑战，在此背景下，政府就不应再局限于通过掌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表达官方意见，而是应当超越意识形态之争，让自己成为意识形态机器运作规则的制定者——正如在市场化改革中，政府不再参与市场竞争，而是成为市场规则的制定者。与此同理，政府不应再参与舆论竞争，而是应该成为舆论场规则的制定者，着力引导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主要是通过制定、修改规则的方式来影响舆论与意识形态的走向，只有这样，才能代表“公意”。基于规则制定者的唯一性，只要如此，政府就能再次在互联网传播领域内重新掌握“文化领导权”，重构意识形态与舆论传播的规则。也就是说，政府不再是所有民众意见的唯一表达者，而是应当让民众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建议，自己则努力成为公共议题的设置者和公共规则的维护者，并通过协商民主、合作民主，制定出政府与社会共同认可的规则，这才是建构新型政社关系的关键。这和政府在传统政社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相比有很大差异。

（责任编辑：杨嵘均）

Development of the Networked Public Sphere and Construction of New Political and Social Relations

WU Qing-xi

Abstract: Modern thinkers have formed two different standpoints (i.e. social ontology and national ontolog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But in fact,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s the supreme public institution and the civil society, the issue of which goes firs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ception of public sphere. The notion of public sphere refers to the field where the citizens' discussions on national activities can form public opinions. The core of public sphere is the opinion field formed by the ideas that can lead the social mentality through the mediation by the mass media.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has caused great changes in traditional social relations. The most notable is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media in the new networked public spher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typ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in line with the era of the Internet requires the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the networked political public sphere.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explore the consensus space where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on the Internet can have a dialogue and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making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production of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s, setting the public agenda and safeguarding the public rules. All this can help form the positive network public opinions, which can be employed to take the cultural leadership.

Key words: networked public sphere; political and social relations; social governance; social media; cultural leadership